

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边界： 历史、现实与趋向

陈相雨

【摘要】新加坡从利用《内部安全法令》压制言论自由，到逐步放开言论自由的边界限制，再到今天追求言论自由与法治之间的平衡，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但与西方的言论自由标准仍有不小差距。言论自由的边界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宗教习俗、价值观念、政治形态等多种因素。在全球化语境中，新加坡的言论自由虽未与西方标准完全对接，但呈现出渐趋松动的发展趋向。其背后的动力既有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也有巩固国家认同的需要，更有执政党自我危机感的驱动。

【关键词】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社会化媒体；国家认同；执政党

【中图分类号】D73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7)01-0048-13

引 言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父、前首相李光耀不幸逝世。终年91岁的李光耀，被认为是成就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关键人物，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也时常因为限制言论自由而遭到严厉批判。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新加坡给世人留下了没有言论自由的印象。中国的学者也大都这样认为：尽管新加坡有着第一世界的经济成就，但其言论自由的程度却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然而，随着新

【作者简介】陈相雨，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社会生态学在读博士后，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及应对研究”(13CXW03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环境抗争事件中的新媒体动员问题研究”(2015M57045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环保维权集体行动中的社会化媒体使用研究”(2016SJB840002)。

加坡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边界正在发生变化，但学界对此关注不是很多，因此深入探究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边界历史演进、现实冲击及其发展趋势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理论框架与文献述评

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作为一个概念，涵义有渐趋模糊的态势，但一般是指以语言或者其他形式公开或不公开地表达思想、传播观点或信息的自由。在狭义层面，言论自由仅仅指言语表达自由；而在广义层面，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等多种形式的自由。本文探讨的言论自由更多侧重于狭义层面。

有关言论自由及其边界的研究纷繁复杂，成果众多。从历史纵向维度来看，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边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步变化的，总体上呈现出从“权利防御”走向“权利限制”的特征。

其一，言论自由权利防御框架。言论自由的思源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6 世纪的雅典民主思想^①，但是，对它的系统研究开始于 17 世纪末。约翰·密尔顿 (John Milton) 的《论出版自由》、约翰·洛克 (John Locke) 的《论宗教宽容》等，提供宗教自由之下的言论自由，为言论自由权利防御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言论自由研究的经典。到了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如德尼·狄德罗 (Denis Diderot)、保尔·霍尔巴赫 (Paul Holbach)、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等^②，将公民自由与言论自由并举，丰富了言论自由权利防御框架的内涵，将言论自由带进了政治研究领域。1859 年，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 (John Mill) 出版了《论自由》，从价值功用的角度论证了言论自由对科学、法律和政治的重大意义，认为言论自由不仅有助于发现真理，促进民主发展，还有助于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密尔的理论直到今天仍有重大影响，其本人也成为言论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

其二，言论自由权利限制框架。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因而不能成为传播暴力、诽谤、煽动颠覆或淫秽信息的理由。米克尔约翰 (Meiklejohn)、罗伯特·博克 (Robert Bork) 等人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思想家，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将言论自由理论的某些内容推向绝对主义，但值得欣慰的

^① See David Smith & Luc Torres, "Timeline: A History of Free Speech", 2006-02-10, <http://www.theguardian.com/media/2006/feb/05/religion.news>

^② Jonathan 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5, p. 781.

是，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当时社会中出现的滥用言论自由的现象。不过，如何界定言论自由的滥用则成为另一个难题。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以“恶劣倾向原则”、“直接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优先地位原则”、“逐案权衡原则”等为内容的言论自由权利限制框架理论逐渐形成^①。此外，在大量言论自由案件审判的基础上，美国逐渐发展出了“双阶框架”理论，即认为“淫荡、猥亵性言论、粗俗言论、诽谤性言论、侮辱或挑衅性言论，并未涉及任何思想及意见之表达，而无任何社会价值，即使可能为社会带来利益，其利益也明显小于限制这些言论所欲维持之社会秩序及道德规范”^②，并逐渐成为美国言论自由权利限制框架的重要内容。

言论自由权利防御框架，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以印花税等形式限制新思想的传播，这显然不符合作为社会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资产阶级为登上历史舞台，继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级，需要更多的言论自由权利，以打破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关系。而言论自由的权利限制框架，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由于权力结构关系对资产阶级有利，剧烈的社会变迁可能使资产阶级失去领导权，维护社会稳定对资产阶级而言至关重要，言论自由权利限制框架因而得到资产阶级更多的推崇。

但是，对于新加坡言论自由及其边界问题的解释，目前却呈现出上述两种框架竞争博弈的局面。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视角，有研究者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主义国家，言论自由根本不存在，或只在最低限度内存在^③。而基于新加坡本土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新加坡的言论自由不能侵犯国家利益、种族和宗教和谐，或者说言论自由不能跑在社会的前面^④。不管是言论自由权利防御框架，还是言论自由权利限制框架，都是历史的产物，与具体历史情境紧密相连。“权利大小”和“限制多少”，都处在变化之中，不但不同国家不同，就连同一国家在不同社会阶段也不尽相同。

① 参见侯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3卷第2辑。

② 参见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北：元照有限公司，1999年，第158页。

③ See C. George, “The Internet’s Political Impact and the Penetration/Participation Paradox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No. 27, 2005, pp. 903–920.

④ See Rachel Chang, “Straits Times ‘Clear Markers for Free Speech in Singapore’”, https://www.mfa.gov.sg/content/mfa/media_centre/singapore_headlines/2015/201501/headlines_20150123.html, 2015–01–23.

二 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历史演进与现实冲击

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国情，因而不同国家的言论自由边界自然不尽相同。但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向着更加“理性”、更加“人性”的方向演进，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新加坡的言论自由状况，虽然饱受国际社会的指责，但总体上呈现出趋向进步的演进轨迹。

（一）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的历史演进

1. 李光耀执政时期的言论自由边界

1965年，被迫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新加坡，面临着严重失业、族群矛盾尖锐、饮用水资源紧张等重大生存危机。为发展经济并以安定的环境、富裕的生活重构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李光耀政府对左翼势力和工人运动予以果断镇压，以此吸引外资进入新加坡。同时，李光耀严控言论自由，凡是有损政府发展目标的言论都被严厉禁止。正如李光耀所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新加坡的国家整体和民选政府的首要目标”^①。事实上，在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是否影响政府和国家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言论自由不可逾越之边界。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只要政府认为言论危害了国家安全，就可利用《内部安全法令》，在不经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对异议人士进行拘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1年，《南洋商报》以不点名的方式指责李光耀为“数典忘祖”的“二毛子”，李光耀政府认为该言论构成了对新加坡安全的威胁，于当年5月2日，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该报的总经理、总编辑、主笔和人事兼公关经理等人。但《南洋商报》并未收手，还连续发表社论予以抗争，最终导致该报社长李有成被捕^②。当时，建国不久的新加坡，根基还不稳，反对派蓄势待发。为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执政党地位的稳固，不经司法程序，援引《内部安全法令》严厉限制言论自由，对李光耀政府而言，是一种适合当时条件的有效选择。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新加坡，由于稳定和发展是第一要务，源于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权利，是被严厉限制和管控的。

2. 吴作栋执政时期的言论自由边界

1990年，吴作栋接替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第二任总理。虽然吴作栋从李光耀手中承继了“威权主义”统治政体，但相对于李光耀而言，他更加亲民，更讲

^① 参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② 参见赵瑞琦《李光耀与新加坡新闻管制》，2010-02-0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536f00100100hv6q.html

究协商参与，提倡给新加坡民众更多的自由空间，鼓励民众使用“正确管道”提出建议。1990年3月，为了让意见多元化，尤其是让使国会之外的其他观点能够得到呈现，新加坡国会通过增设官委议员的宪法修正案，即规定在83席民选议员之外，增设6席官委议员，由总统委任，任期两年，不在政府中拥有公职，不为选区服务，旨在反映独立和超党派的意见^①。2001年，为了增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制衡，吴作栋设立人民行动论坛，允许其以独立于执政党的立场审视、评价和批评政府的政策主张，且人民行动党议员和官委议员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应免受人民行动党党督的限制。在吴作栋执政时期，新加坡政府为显示社会的自由开放，甚至在芳林公园开辟了“演说者角落”，允许异议人士进行受限制的自由演说。虽然在演讲者、演讲内容、事先登记等方面，新加坡政府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但较之以往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作为保守的政治精英，吴作栋虽然没有根本改变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但在他的努力下，程序民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元素也逐渐增多，普通民众和异议人士有了可以相对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这与李光耀执政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新加坡的言论自由边界在吴作栋执政时期是在逐步扩张的。

3. 李显龙执政时期的言论自由边界

2004年，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第三位总理。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新加坡民众对自由有了更多的渴望。李显龙执政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能否给民众更多的自由空间，尤其是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的程度高低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而新加坡的执政精英，一直都强调新加坡是继承西方威斯敏斯特体系的民主国家，这也促使李显龙政府不断推进言论自由的边界扩张。2008年，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要深入开放芳林公园演说，即新加坡公民无须警方同意，就可在演说角组织或者参加示威活动，外国人在警察许可情况下也可以组织和参与，前提是言论自由不能触及种族和宗教问题的底线^②。这是新加坡独立以来，首次允许民众在户外进行自由示威，登记获准手续也由警方转移到了公园管理局^③，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李显龙政府对言论自由边界控制的松动。李显龙还表示要继续推进政治开放原则，允许制作与传播政治影片，即使在大选期间，也允许自媒体制作者通过互联网传播涉及竞选议题的视频内

^① 参见孙景峰、刘佳宝《“新加坡式民主”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9期。

^② 参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首次宣布准许国民户外示威》，2008-08-19，<http://news.163.com/08/0819/15/4JNJ8UFB000120GU.html>

^③ 孙景峰、孙培《芳林公园的进一步开放与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趋势》，《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容^①。这些都是前两任总理未曾做过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李显龙政府推进言论自由边界的扩张是有限度的（从执政视角而言，也可将其视为另外一种谨慎和务实），正如他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未来将出现变化，年轻人也会有各种诉求，但支持人民一味挑战权威与制度，不是新加坡要走的方向，国家必须在确保人民有空间发表看法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②显然，李显龙执政时期的新加坡，言论自由状况较之于以往有了明显进步，这不仅表现在言论自由边界的渐趋宽松，更表现在满足民众对自由渴望的同时，更加注重在自由与法治之间找到平衡。

不可否认，李显龙政府正在顺应时代要求，稳步推进言论自由的边界扩张，但是，世界形势和新加坡的社会环境正在急剧变迁，不断冲击着当前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边界。

（二）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的现实冲击

在新加坡，很少有媒体会批评政府，即便是在新加坡运行的西方媒体也是如此。在新加坡执政者看来，媒体只能“上情下达”，而不能进行“舆论监督”，因为媒体不是由选民选出来的，所以只能拥有“有责任的新闻自由”^③。但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在新加坡崛起以后，对执政当局不满的批评之声开始在网络空间大量涌现，而且直接冲击着新加坡为言论自由所设的边界。近年来有两起案件最为引人注目。

案件一：2014年5月15日，33岁的新加坡公民鄞义林（Roy Ngerng）在博客发表《你的公积金款项去了哪里？——城市丰收教会审讯的启示》一文，得到网民的大量转发。鄞义林在文中批评了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养老储蓄制度）不够透明，并影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贪污。之后，李显龙以个人身份起诉鄞义林涉嫌“诽谤”。虽然鄞义林删除博文，发表道歉声明，并表示愿意支付5000新币的赔偿金，但李显龙律师以“诚意不足”为由不接受道歉。最终，经法庭审理判决，鄞义林向李显龙赔偿诉讼费和律师费35,000新币。在诉讼过程中，鄞义林得到不少新加坡人的支持，虽然诉讼费用高昂，但在较短时间内就有三四千人为他筹集到了10万新币的款项。而李显龙虽然亲自出庭接受质询达6个小时之久，但仍给外界留下“以大欺小”之嫌疑，因为鄞义林毕竟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他也因此案而丢掉了工作。

^① 参见蔡添成《政府要放宽政治空间数反对党领袖持保留态度》，2008-08-20，<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singapore/ndp2008/story20080820-99255>

^② 《余澍杉鄞义林案惹关注 李显龙：一味挑战权威非新加坡之路》，2015-07-03，<http://www.nanzao.com/tc/international/14e523a1fbd5703/>

^③ 赵瑞琦、李明娜《新加坡媒体政策评析》，《中国出版》2010年3月（下）。

案件二: 2015 年 3 月 27 日, 新加坡 16 岁少年余澎杉 (Amos Yee) 在 YouTube 上发布“李光耀终于死了”的视频。他在这段全长 8 分 38 秒的视频中, 不但发布了李光耀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头像的猥亵合成图像, 而且以英语夹杂粗口批评李光耀为独裁者, 将其和耶稣基督联系起来, 说他们都是“渴望权力且恶毒的人物”。同时, 对现任总理李显龙隔空挑衅喊话——“有种就来告我”。警方在接到多人举报后依据《刑法》和《防免骚扰法》逮捕余澎杉, 并指控其犯有以电子媒介散布猥亵图片、蓄意伤害基督教徒感受以及传播视频对他人构成骚扰等三项罪状。经过三次保释三次还押, 以及被移往新加坡精神病院作评估, 最终, 2015 年 7 月 6 日, 余澎杉被法院判处监禁 4 周。因其刑期从 6 月 2 日还押日算起, 余澎杉于判决当天即获得释放。

上述两例案件都被西方国家视为新加坡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典型事件。尽管两例案件有着诸多不同, 但共同之处异常明显, 即它们都突破了新加坡执政当局为言论自由所设的“边界”。新加坡宪法第 14 条规定: 新加坡公民享有言论自由, 但不是绝对的, 国会出于维护国家和公共秩序、社会道德、外交关系等原因, 可根据“必要或有利”原则, 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最高法院在 2005 年表态“必要或有利”原则赋予了国会更宽广的自由裁量范围^①。这就意味着, 国会对言论自由的边界限制具有主导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是国会第一大党, 虽然国会也存在反对党, 但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独大”, 因而其对国会具有主导权。案例一中的鄞义林的言论, 虽有“公民问政”成分, 但却让执政当局自觉自身合法性受到削弱。长期执政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以“廉洁”著称, 党员都身着白色衣服, 以向民众宣示“廉洁奉公”的形象, 人民行动党党员因此又叫“白衣人”。假如李显龙对此不回应、不澄清、不自证清白, 则会影响其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尽管鄞义林的言行在很多西方国家可能比较常见, 但在新加坡独特的政治文化中则无法被容忍, 作为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认为鄞义林的言行挑战了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边界”, 这也正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对鄞义林“斤斤计较”的根本原因。而案例二中的余澎杉, 虽然也揭示出了诸如新加坡贫富差距大、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等问题, 但并没有具体的问题指向, 相反更多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和宗教偏见, 对宗教问题极为敏感慎重的新加坡社会同样也对其无法容忍。在余澎杉案中, 大多数民众不仅不予支持, 相反还视余澎杉为“不良少年”或“民众公敌”, 甚至还有人在余澎杉出庭前对其掌掴, 并且引发

^① “Article 14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ingapo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_14_of_the_Constitution_of_Singapore, 2016-6-23.

新加坡网络上的赞扬之声^①。仅从这一点就可以发现，新加坡执政当局为言论自由所设的边界，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

当然，这两例案件在国际社会看来就是新加坡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因为国际社会是将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权利价值观念来看待的，他们在强调言论自由的时候，并不考虑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受制于所在地区的宗教习俗、价值观念、政治形态等因素。就新加坡而言，在宗教习俗上，新加坡提倡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容忍和包容，以致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已成为常态；在价值观念上，东西方文化在新加坡相互融合，以“国家至上”为先导的共同价值观教育，深入人心，并几乎在所有社群中得到认同^②；在政治文化上，新加坡虽然具有西方民主政体的显著特征，但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威权主义文化依然存在^③。这些都在影响和限制着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边界，但西方社会显然很少考虑到这些。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有西方国家将有利于自身的言论自由框架，强行销往像新加坡这样的非西方国家，进而导致各种各样的言论自由事件的发生。

三 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的发展趋向及动力

类似鄞义林和余澎杉这样的事件，虽然被西方社会视为限制言论自由的典型，但新加坡的执政精英并不接受，他们更多从新加坡本土视角予以反驳，即认为言论自由应尊重一个国家的宗教习俗、价值观念及政治形态，尤其是不能侵犯宗教、种族和谐和国家利益。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言论自由思想，正借助现代媒介技术给后发国家带来深刻改变（其中也包括负面的改变），深处全球化前端的新加坡自然也无法避免。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新加坡政府对此也不得不作出调整和回应。

（一）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的发展趋向

事实上，新加坡的言论自由边界正呈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网络言论自由环境的持续宽松。新加坡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是政府对传统媒体的控制相当严格，在新闻与艺术部有专门负责监管媒体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会查阅媒体报道和相关视频节目，一旦发现问题就会采取相应的干预

^① 《掌握余澎杉男子梁锦华被判坐牢三周》，2015-05-11，<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

^② 卢艳兰《以文化人：构筑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学术论坛》2013年第8期。

^③ 参见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手段（例如警告、吊销执照、逮捕主编等）。换言之，即媒体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以致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论都被禁止^①。但是当网络媒体崛起之后，虽然新加坡政府重视对网络媒体的监管（例如收取网站保证金、关闭有损新加坡政府形象的独立网站等），但是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言论自由环境则宽松许多，境外不同立场的网站和网页都可以访问，境内社会化媒体也会出现严厉批评政府的言论。换言之，新加坡民众通过社会化媒体很容易看到批评人民行动党和政府的言论。例如，有一篇题为《丑陋的新加坡大选，骗人的李光耀》的文章，对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的“攻击”可谓毫不留情，但像这样的文章今天的新加坡民众还是很容易看到的^②。而且，像鄞义林和余澎杉这样的异议人士仍然未丧失表达自由，仍然活跃于网络空间并持续抗争。以余澎杉来说，遭遇 4 周的牢狱之灾并未让他学乖，相反他以更加极端的言辞指责李光耀“比 2011 年丧命的奥马尔·本拉登更糟”，因为“起码大家都知道拉登是个坏蛋”^③。而且，余澎杉的这些批评性言论至今未被删除或屏蔽，他本人目前也未再受到任何官方指控。新加坡国会议员马炎庆认为新加坡是有言论自由的，因为网络上天天都有骂政府的声音，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于李光耀时代了^④。仅从这方面而言，可以认为新加坡的网络言论自由环境正在持续宽松。

其二，“言论自由”的司法限制出现松动迹象。很长时间以来，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以“诽谤罪”严厉打击异议人士和限制公民言论自由，很多民众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不敢发表针对政府的批评意见，甚至在很多新加坡人身上已形成自我审查的“惯习”。但是，近年来某些言论自由的司法限制出现松动或减弱迹象。最为典型的就是本文中的案例二。余澎杉原本被指控犯有以电子媒介散布猥亵图样、蓄意伤害基督教徒感受以及传播视频对他人构成骚扰等三项罪状，但最终判决却是前两项罪名成立，而第三项罪名不成立，这让很多人感觉意外。因为第三项罪状是余澎杉“诽谤”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为“独裁者”的不敬言论，要知道这种言论在李光耀时代是绝不可容忍的。例如，2004 年 9 月，《经济学家》发文批评新加坡政治更迭中存在“裙带关系”，李光耀威胁要诉诸法

① 《李光耀半生执政路上的“黑与白”》，http://news.tom.com/2015-03-23/OKV9/02163367.html?source=HP_TOPIC

② 张振海《丑陋的新加坡大选，骗人的李光耀》，2011-07-13，<http://blog.renren.com/share/285833314/6359424341>

③ 《批李光耀被捕的新加坡少年余澎杉：李光耀比本拉登更糟》，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5_08_09_329954.shtml

④ 参见张喆《新加坡议员：只要李光耀健在，有些人就不敢太大声讲话》，2015-03-18，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1967

律，后来该杂志刊登了公开道歉信并赔偿损失，此事才得以平息；2010年2月，美国《纽约时报》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菲利普·鲍林（Philip Bowring）在《同为一家人》的文章中，将李光耀父子列入所谓的“亚洲政治王朝”，暗指李显龙靠“世袭”而非真本事当上总理，李光耀等控告作者诽谤并最终胜诉^①。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早在1994年就对菲利普·鲍林的相似言论进行控告并获胜诉，而这次同样不手软，足见李光耀维护自身名誉以及执政合法性的决心。李光耀曾说过“当人们可以挑战上至英女皇的一切事物，可以摧毁皇室、削弱教会影响力、贬低国会和他的议员、诋毁法庭并对警察质疑时，社会还能保有什么秩序？”^②在案例二中，第三项罪名不仅是余澎杉惹怒新加坡民意的关键，也是国际社会指责和批评新加坡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最主要依据，但最后的判决竟是此项罪名不成立，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尚属首次，足以说明新加坡政府以司法限制言论自由的界限有松动调整的迹象。

其三，反对党言论受限情况有所改观。李光耀认为“没有执政党会扶植反对党执政，必须在反对党羽翼未丰的时候铲除掉他们。”^③李光耀既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做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Jeyaretnam）连续当选1981年和1984年两届议员，因批评李光耀兄弟担任多家公司董事而遭控告，最后他不但丧失了议员资格，而且还因此破产。1997年大选，李光耀和吴作栋对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提出诽谤诉讼，邓亮洪被迫离开新加坡^④。2001年，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被控告诽谤，2006年因缴不起赔偿金而破产^⑤。在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反对党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始终被控制在人民行动党所设定的范围内，以致反对党无法壮大。我们知道，言论自由边界越宽松，反对党可伸展的空间就越大。一直以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掌控言论自由边界，并以此压制反对党的发展壮大。因为反对党要想在国会获得更多的席位，就必须拥有更多的选票，而要获得更多选票，则必须能在各种公共场域，“为民发声”、“替民立言”，这是反对党必须走的道路。倘若言论自由边界收紧，反对党不仅无法有效监督执政党，更谈不上对执政党取而代之。近些年来，此种情况有了一些改观：不仅少有反对党候选人或

^① 参见胡贲《在新加坡法院 李光耀父子再次击败〈纽约时报〉》，2010-04-01，<http://www.infzm.com/content/43399>

^② 赵瑞琦《李光耀与新加坡新闻管制》，2010-02-0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536f00100hv6q.html

^③ 王江雨《李光耀是专制社会的独裁者吗？》，http://news.ifeng.com/a/20150323/43397402_0.shtml

^④ 参见韩山元《1981年安顺补选 惹耶勒南当选进入国会》，<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singapore/sg50/others/story20150419-470267>

^⑤ 张铁志《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吗？》，2011-05-19，<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9883924/>

议员因批评执政党而被起诉，就连反对党与人民行动党在国会辩论的情况，都能在人民行动党控制的主流媒体得以相对客观地呈现。尤其是在2015年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雄心勃勃，声势浩大，包括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内的多个反对党候选人，对以李显龙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提出了很多政策批评，并且这些批评在当地主流媒体上几乎都能全面得到呈现，而这是以往所没有的。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形成这样的判断：新加坡的言论自由边界虽然受制于当地的宗教习俗、价值观念以及政治形态等多种本土因素，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标准存在差距，但由于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变迁，其言论自由边界总体上呈现向外扩张的发展趋向。

（二）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扩张的动力

那么，是什么推动着新加坡言论自由边界的扩张？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新加坡历来主张对新闻媒体严格管制。李光耀1988年4月在美国报章编辑协会演讲时说“将传媒视为第四权的理论，并不适合新加坡。我们不能让本地传媒扮演像美国传媒那样的角色：监察、对抗和质疑当权者。”^①李光耀也曾明言“我不接受报章的东主具有可以为所欲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利。报章东主和属下记者不像新加坡的部长，他们不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报章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李光耀所言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完全适用，而且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也完全可以做到。但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化媒体的深度发展使得执政当局的传播控制越发艰难。因为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发言，而要实现了对每个人的管控几乎不可能。正如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言，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③。而这种“补救”，则让民众相对突破了政府的限制，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言论空间。

不仅如此，民众还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找到“相似的彼此”，在交流互动中建构共意，进而形成推动社会变迁的集体能量，而言论自由边界的扩张，不仅是社会化媒体崛起带来的自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变迁的关键前提。

^① 王江雨 《李光耀是专制社会的独裁者吗？》，http://news.ifeng.com/a/20150323/43397402_0.shtml

^② 赵瑞琦 《李光耀与新加坡新闻管制》，2010-02-0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536f00100hv6q.html

^③ 参见〔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其二，巩固国家认同的需要。国家认同，是由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所组成的“四位一体”^①，涵义相对宽泛。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其实都是“国家认同”，即对某一具体形态的国家认同，指向自己“归属于何种国家范畴或者组织”^②。新加坡作为新兴经济发达国家，以实用主义为基本价值导向，推行全面开放的经济自由主义战略，已将自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为配合这一经济战略，新加坡大力推行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教育（事实上英语已成为第一语言），虽然解决了新加坡不少现实问题，但也产生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即国家认同危机的隐现。具体而言，随着新加坡社会西化程度越来越高，受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的民众也随之增多，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越来越难以认同。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父辈们所经历的种族冲突、经济困顿、资源危机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无法感知；政府廉洁高效、社会稳定运行、人均收入位居全球前列等发展成果，他们也已习以为常；以人权和自由为特征的西式民主形态，在全球化语境中成为他们的价值追求；李光耀留下的政治遗产，越来越难以被他们所接受。此外，以“一党独大”、“限制言论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加坡模式，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又处于“道德洼地”状态，并长期遭受西方社会的严厉批评，有时还被冠以“威权制度”或“独裁政治”的标签，被大加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致力于打造“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概念，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还面临严峻挑战，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新加坡50年内持续成功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维持独特的国家认同”^③。当下，新加坡面临国内优秀人才不断移民海外等问题，也正是新加坡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侧面的有力佐证。出于巩固国家认同的需要，新加坡政府也不得不考虑顺应潮流，给予民众更多的言论自由空间。

其三，执政党的自我危机感。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已经超过50年，目前是世界少有的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虽然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之下，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并成为第一世界国家，但它因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而受到批评。尤其是近年来，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争取更多的公民权利、反对一党独大的声音在持续走高，以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

^① See Wang Zhuojun & He Hual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35, No. 2, 2014, pp. 139 - 154.

^② J. E. Stets & P. J. Burke,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3, No. 3, 2000, pp. 224 - 237.

^③ "Three Biggest Challenges Singapore will Face up to SG100: Lee Hsien Loong", 2015 - 07 - 23,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three-biggest-challenges/2002256.html>

的得票率整体出现下滑态势。例如，在 2011 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 60.14%，可谓历年最低，而李光耀在选前又要挟阿裕尼集选区选民，以致人民行动党在该选区惨败^①。2015 年大选被誉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这是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治的转折点。人民行动党能否连任，很多人都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每一个选区都有反对党参战，七个反对党联手推出“为改变投票”的徽章，以示要改写新加坡的政治版图。反对党为“变天”所作的各种“摩拳擦掌”，不断加剧 2015 年大选的不确定感，同时也置执政党于强烈的自我危机感之中。作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李显龙，多次表态要倾听民众呼声，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今天的新加坡已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不相同，社会更加多元化，新加坡政府的治理挑战在于给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同时，也确保这不会造成负面结果。”^②而在 2015 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最终以 69.9% 的压倒性得票率完胜反对党，其重要原因在于反对党所反对的正是执政党正在改变的，而且执政党对待改变的态度及行动已经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结 语

新加坡并非像有些西方国家批评的那样没有言论自由，只是其状况与西方国家标准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从历史纵向维度来看，新加坡从以《内部安全法令》压制言论自由，到逐步放开对言论自由的边界限制，再到今天追求言论自由与法治之间的平衡，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而且，随着新加坡的社会转型，言论自由的边界将会逐步扩大。言论自由的边界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宗教习俗、价值观念、政治形态等多种因素。在全球化语境中，新加坡的言论自由边界虽然未与西方标准完全对接，但呈现出渐趋松动的发展趋向，其背后的动力既有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也有巩固国家认同的需要，更有执政党自我危机感的驱动。当然在根本上，也是新加坡执政党不断适应社会变迁和发展需要的表现。

【责任编辑：吴宏娟】

^① 在 2011 年新加坡大选前，李光耀对阿裕尼集选区的选民讲“如果你们投给反对党，你们这里就会变成贫民区。”结果引起该选区选民反感，最终工人党战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阿裕尼集选区的国会席位。参见张喆《李光耀的另一面：如果你们投票给反对党，这里就会变成贫民区》，2015-03-20，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2317

^② 诗华《李显龙：在自由与法治间取得平衡》，2015-07-27，<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4655>

discussed.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SCS issue will be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Vietnam foreign policy of next few years when the 12th Vietnam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orks.

【Keywords】 Vietnam;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South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Issue

【Author】 ZHANG Mingl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CHI Buyun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system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d a perspective shift from typology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For the countries which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the degree of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crucial.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 four measurement standards for the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es and state, the social basis of parties, the competition mode among partie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of parti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riterion, the current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Indonesia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Low institutionalized party system hi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s democracy from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aspects.

【Keywords】 Indonesia Politic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Author】 CHI Buyun, Ph. D. Candidates,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Border Expans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Singapore: History, Reality and Trends

CHEN Xiangyu

【Abstract】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been showing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dealing with freedom of speech for the measure shift from suppressing dissenters through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without judicial proceedings, to using judicial means to restrict them, to reaching balance between “freedom of speech” and “law rule”, but the level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this country remains lower than western standards. Border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this nation always is subject to many local elements such as religious custom,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Americanization”, Singapore does not sink into the western system incompletely, but takes a more pragmatic approach to expand the boundary of “freedom of speech”. The power behind comes from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the need to build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ense of self-crisis of ruling party.

【Keywords】 Singapore; Freedom of Speech; Border; Social Media; National Identity; Ruling Party

【Author】 CHEN Xiangyu,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Humanity & Social Science, Post Doctorate of Social Ecolog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The Sorrow of War and Asian Peace

SUN Laichen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at revealing the humanist and anti-war origins of Bao Ninh’s world well-known novel *The Sorrow of War* and discussing its significance toward Asian peace. Research on this novel remains at the superficial level in the world (including Vietnam), and this essay approaches it from the *longue durée* of Vietnam’s cultural and literary history and Sino-Vietnamese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explores the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the thoughts in *The Sorrow of War*.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Bao Ninh’s description of “*Jungle of Screaming Souls*”, this essay compares it with Nguyễn Du’s “*Calling All Souls* (chiêu hồn).” In addition, this essay compares Bao Ninh’s novel with Đặng Trần Côn’s *The Song of a Soldiers Wife* (Chinh phụ ngâm) and discovers that they are extremely similar in terms of revealing the sorrow caused by war and their condemnation of ruinous wars. Last, regarding the war-promoting voices due to the tension among Asian countries, this essay discusses Bao Ninh’s anti-war action and thoughts, calling on Asian people to read his novel and maintain Asian peace.

【Keywords】 The Sorrow of War; Peace of Asia; Vietnam; Bao Ninh; Vietnam War; Anti-War

【Author】 SUN Lai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USA